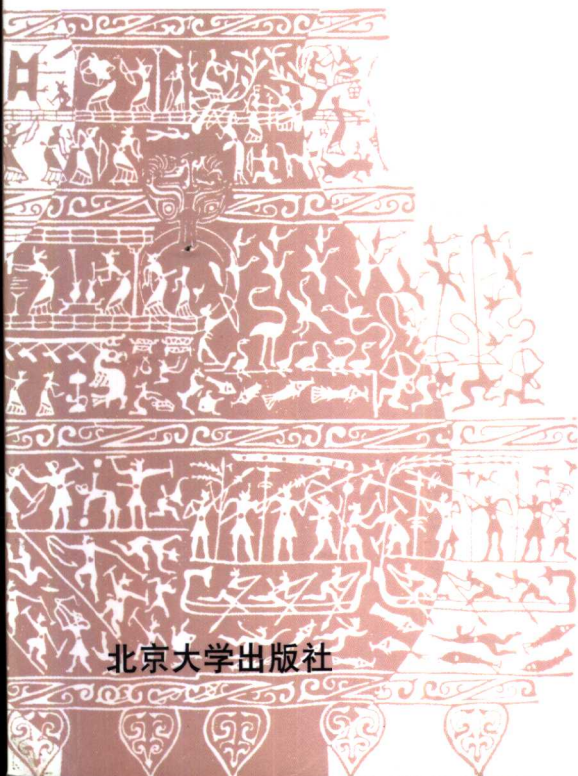


何 晋 著

《战国策》研究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国学研究丛刊之十四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国学研究丛刊之十四

《战国策》研究

何 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国策》研究/何晋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12
(国学研究丛刊)
ISBN 7-301-05101-8

I. 战… II. 何… III. 战国策-研究 IV. K23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2481 号

书 名:《战国策》研究

著作责任者:何 晋

标准书号:ISBN 7-301-05101-8/I·580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www.pup.com.cn 电子信箱:zpup@pup.pku.edu.cn

电 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25

排 版 者: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mm × 1168mm 32 开本 7.25 印张 200 千字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提 要

本文主要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战国策》进行专题研究。通过综合运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充分利用已有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分别考察了刘向编定《战国策》、刘向编定之前的“战国策”、今本《战国策》的情况。这些专题的研究涉及:《战国策》的书名、记事起止;《战国策》成书之前的情况、编著者;今本《战国策》的佚失、性质、注释。本文的部分研究是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上作进一步的深入,部分研究则对旧说加以驳正提出新论,另一些部分则提出新的或者尚未解决的问题并试图解决,这包括:通过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和《史记》来推测原始的“战国策”,详细考察《战国策》佚文证明今本和刘向编定本差距不大,论证《战国策》非史著,比较《战国策》姚注、鲍注和吴注的特点及其优劣。通过上述这些探讨,本文力图在《战国策》一些较重要的基本问题的研究上有所进展和突破。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刘向编定《战国策》	(5)
第一节 关于书名	(6)
第二节 关于记事起止	(15)
第二章 刘向编定本之前的“战国策”	(24)
第一节 对中书的推测	(24)
第二节 “战国策”的编著者	(59)
第三章 今本《战国策》	(83)
第一节 今本和刘向本	(84)
第二节 论《战国策》非史著	(132)
第三节 《战国策》姚注、鲍注与吴注	(154)
第四节 《战国策》引书	(178)
附 录	(191)
引用文献	(205)
参考文献	(210)
后 记	(225)

序 言

1. 选题解释

《战国策》的研究作为本文的选题。研究的范围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战国策》被刘向编定时的有关情况;(2)《战国策》在刘向编定之前的情况;(3)今本《战国策》的佚失、性质及注释问题。可见,本文是从文献学对《战国策》所进行的一些专题研究,并不带有全面综述的特征。题目“《战国策》研究”的确定,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首先,本文所有的专题研究均直接针对《战国策》;其次,本文涉及的专题基本包括了《战国策》作为一部典籍所应讨论的重要问题;再次,就作者的思考而言,彼此相较,其他的题目似都不能更好地对本文的研究内容进行统属。

2. 所用资料

文献资料是本文运用的最主要的资料,它们包括:(1)所有《战国策》的文本资料,即各种版本的《战国策》,以及能被肯定的诸条《战国策》佚文;(2)直接对《战国策》进行研究的资料,即研究《战国策》的论文与专著,包括国内的也包括国外的;(3)和《战国策》研究间接相关的资料,它们自身并非研究《战国策》,但其研究成果或文字资料有助于阐释或说明《战国策》的某些相关问题。此外,与《战国策》相关的考古资料在本文的研究中亦受到重视,出土的帛书写本《战国纵横家书》的资料在文中大量引用。

3. 研究回避部分

纵横家,无论其作为一个人物团体还是一个学派,其产生的背景、思想、对战国政治的影响等等都和《战国策》的研究有关,但这些都是专门的题目,本文不予重点讨论,除非这种讨论与问题直接关联不可回避时。与这种情况相同的,还有诸多与《战国策》相关的历史研究,本文一般不专门涉及和引申;此外《战国策》一书所反映的思想亦是一重要问题,本文也未涉及。

4. 研究现状综述

在历史上,《战国策》的诸多注家当是最早的研究者。清代,注释的工作仍有继续且不止一家,例如于鬯《战国策注》、金正炜《战国策补释》,日本学者关修龄也有《战国策高注补正》,横田惟孝有《战国策正解》;在校勘方面黄丕烈的《战国策札记》无疑最具代表性;此外还有以学术笔记等形式出现的有价值的局部研究也非常值得一提,如王念孙《读书杂志》中的《战国策》部分。对《战国策》的专题研究也在清代十分瞩目,例如在编年、地理等方面,有林春溥《战国纪年》、程恩泽《国策地名考》、张琦《战国策释地》、顾观光《国策编年》、《七国地理考》等。

近现代以来,对《战国策》的专题研究趋于详细和深入。尤其是30年代在学界疑古风气之下,有关《战国策》作者的热烈讨论由罗根泽、金德建等人的文章而展开,随后是据《战国策》对苏秦、苏代、张仪等人的历史辨伪研究。此时期,钟凤年《国策勘研》(1936)的发表受到诸祖耿过低的评价,钟氏此书计划颇宏,分列诸多专题,且已完成部分研究做出成绩,可惜未竟;诸氏则对《战国策》佚文有所辑考。齐思和《〈战国策〉著作时代考》(1948)对《战国

策》的著作时代、作者的考证则带有总结性,代表了当时较高的水平。1949年后,仍然还有的对《战国策》作者的探讨并没有大的突破,但有关苏秦的研究在徐中舒《论〈战国策〉的编写及有关苏秦诸问题》(1964)一文中得到深入。同时有关纵横家的研究在港台一些学者中有所进展。1973—1974年帛书写本《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使《战国策》的研究有了突破,尤其是关于苏秦的历史。帛书后来亦引起了日本和美国学者的注意,他们都把帛书和《战国策》作了比较研究,但在兴趣上主旨还是研究帛书,在利用帛书研究《战国策》上则做得不够,这也反映在帛书出土早期国内学者的研究上。帛书研究的成果,很快就被同时期郑良树的专著《战国策研究》(1975)有所利用,郑氏此书对《战国策》的作者、注释、佚文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战国策》的版本流传、注释、反映的思想、与《史记》、《韩非子》的关系诸问题,在70年代末至90年代亦有不少论文涉及,在《战国策》研究的不同层面上取得了或多或少的成就。至此,许多研究《战国策》的零星成果,已有总结的必要,尽管在部分专题上仍需要重新提出深入研究。

5. 本文之目的及取得的成果

鉴于上述研究现状,本文一些部分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综述,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已有的一些成果加以继续论证和肯定,因为在今天这些成果还常常不被人接受或受到忽视;二是对过去的一些结论提出批评,重新进行考察,这使得本文在某些问题上批驳的态度十分明显。本文另一些部分则提出新的或者尚未解决的问题并试图解决,这包括通过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和《史记》来推测原始的“战国策”,详细考察《战国策》佚文证明今本和刘向编定本差距不大,论证《战国策》非史著,比较《战国策》姚注、鲍注和吴注。

6. 本文尚未解决的问题

由于才疏识暗以及时间的限制,还有以下问题本文尚未解决:(1)除了《韩非子》,《战国策》还和其他一些诸子著作甚有关联,例如和《商君书》、《汉志》所载的《苏子》、《张子》等,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本文没有解决;(2)《战国策》一书反映的思想内容没有作探讨;(3)从史学角度出发的许多相关研究没有进行。

7. 形式结构和技术处理

本文分三章,讨论五个问题,重点放在第三章。第一章讨论刘向编定《战国策》时中书的书名和当时他所编录资料的时间起止;第二章讨论刘向编定《战国策》之前的“战国策”的情况,以及“战国策”的编著者。第一、二章的讨论是第三章研究的基础,正是有了第一、二章的讨论,第三章的研究才得以展开。第三章主要是对今本《战国策》的研究,着重考察了今本《战国策》的佚文、性质、注释三方面的问题。

在技术处理上,其一,由于此研究课题的特殊,本文出现了大量的引文,它们在大段出现时将使用区别于正文的字体。其二,关于注释,我全部采用脚注而不用尾注,主要是考虑到阅读时的方便;在方法上,在正文注释中仅列出征引文献的作者、年代及所在页,将征引文献的详细情况置于文末“引用文献”部分。其三,为有效地说明某些问题,采用了列表的方法。另外,在征引研究资料时,于前辈后贤均冒昧只称姓名,惟于曾授业者称先生。

第一章 刘向编定《战国策》

公元前 26 年左右,正是汉王朝河平年间,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刘向奉中央王朝之命,对当时现存的国家图书进行一次系统的校理。这是中国文献学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对典籍的全面整理。在实际校理中有所分工,^①但每一部书校理完成之后,“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奏录给皇帝。^②其中有一批书,大多记载战国游士的策谋,因此经过整理后所成之书,刘向把它定名为《战国策》。对于此书,刘向给皇帝奏录时,做了如下的报告:

“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莠,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重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③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④

刘向的这篇《战国策书录》,概述了他当时编定完成并为之命名的《战国策》在书名、内容、编次、体例等方面的基本情况。

① 《汉书·艺文志》总序:“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威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班固,1962,页 1701。

② 《汉书·艺文志》总序云:“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班固,1962,页 1701。

③ 姚宏校:“‘字’,一本作‘类’字。”(引见何建章,1990,页 1355—1357)

④ 刘向《战国策书录》。引见何建章,1990,页 1355—1357。此后所引,不再注出处。

经刘向编定后,《战国策》流传至今,由于它在史学和文学上的价值,使它受到学界的重视。和其他先秦秦汉时期的典籍类似,有关《战国策》的来源、成书、佚文诸问题,在学界依然颇有争论而未达成共识,这种争论一方面反映了学术本身应该具有的多元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战国策》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根据刘向上奏的这篇《战国策书录》,以及今本《战国策》的一些情况,可以大致描述出当时刘向编定《战国策》的一些基本面貌。之所以根据今本《战国策》的一些情况,是因为,流传到今天的《战国策》和刘向当时编定的《战国策》,在内容上基本不变而相去不远,这一点,在本文第三章的第1节有详细的论证。

第一节 关于书名

根据刘向《战国策书录》,可知他所编定的这部《战国策》,是整理中书中的一类书而来,所谓“中书”,是指汉王朝宫廷中秘所藏之书,^①这一类书中,有的书有名号,但名号各异,有的书又是按国别编录的。为叙述上的方便,可将中书中的这一类书分为两种,一种是除“国别者八篇”外的中书,一种是“国别者八篇”。

① 《汉书·楚元王交传》:“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颜师古注:“言中者以别于外。”又“河平中,(刘歆)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班固,1962,页1950,1967)可知刘向奉命所校,乃王朝宫廷中秘之书,即所谓“中书”。实际上,刘向在校理中秘之书时,还常常以“外书”作为参考材料,所谓“外书”,是中秘所藏书之外的本子,包括太常、太史、博士、大臣等所藏之书,所以刘歆《七略》说:“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见《汉书·艺文志》如淳注引,班固,1962,页1702)我们再看今存刘向的一些其它书录,《管子书录》云: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仇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重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

《晏子书录》云:(转下页)

* 刘向当时所看到除“国别者八篇”之外的记载游士策谋的这些中书,有名号的有六部,它们分别叫做《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对这些不同名号的中书,郑良树在《战国策研究》中有这样的推测:《国策》、《国事》是分记各国的史事,属于记事的一类,“所谓《国策》,各国之典策也;所谓《国事》,列国之事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仇中《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仇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臣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重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篇,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谨颇略笺,皆以定以杀青,书可缮写。”

《列子书录》云: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仇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三十篇。以除重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及在新书有阙,校仇从中书,以定皆以杀青,书可缮写。”

《邓析子书录》云:

“中《邓析》书四篇,臣叙书一篇,凡中外书五篇,以相校除重复,为一篇,皆定杀,而书可缮写也。”

《孙卿书录》云: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仇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重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以杀青简,书可缮写。”(上所引书录见张舜徽选编《文献学论著辑要》,铅印本。又见《师石山房丛书本别录佚文》。)

又《初学记》卷二十一引刘向《别录》云:“所校讎中《易传》、《淮南》(二字原本无,据《玉海》卷三十五引《初学记》补)、《九师道训》,除复重定著十二篇。”(所引见余嘉锡,1985,页103)

研究这些书录,我们发现它们在用语和形式上有着惊人的相似,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刘向书录言所校〔或云校仇〕“中《××》书”或者“中书《××》”,都是指中秘所藏之书,即中书;《管子》、《晏子》、《列子》、《邓析子》诸书都有外书参校,所以在书录中都有“凡中外书〔或云内外书〕××篇”的总结用语,《荀子》只是用中书中的书来校理而无外书可参校,所以没有“凡中外书××篇”的用语。《战国策》即属于《荀子》这一类的情況。

也。”^①《事语》、《长书》、《修书》则属于记言的一类,主要记载游士的言辞,《短长》则是学纵横术者平时磨练揣摩的习作,所记主要是“策略”和“言辞”。

郑氏分析今本《战国策》的内容发现,有一些篇章,它们主要偏重于史实的记载,不重视言语的技巧,这些篇章还都有很明显的“国别色彩”,叙述史事比较客观;有一些篇章,它们偏重于言语的记载,重视言语的技巧,所记比较主观,不记史实,没有显著的“国别色彩”;还有一些篇章,它们和主要记载言辞的那些篇章相似,所记大部分是言辞而少史实,此外还记策略。郑氏对今本《战国策》内容的这种归类分析,无疑是细致的,但他据此得出的推论却大可商榷。显然,我们不能因为今本《战国策》中有一些着重于记载史实不重言语的篇章,便推论中书中的《国策》、《国事》就是记载史实的;同样,也不能因为今本《战国策》中有一些着重于记载言辞少记史实的篇章,有一些着重于记载言辞和策略可能是学纵横术者习作的篇章,便去推论《事语》、《长书》、《修书》是记载言辞的,《短长》是学纵横术者的习作。郑氏的这种推论有一个先入为主的错误的前提,这个错误的前提是:中书中的《国策》、《国事》就是记载各国史实,《事语》、《长书》、《修书》就是记游士言辞,《短长》是记学纵横术者的习作。他先拟设了这样一个前提,再在这个前提下,在今本《战国策》中去分析寻找材料来加以论证。

中书名号虽然繁多,其实可以从字面上大略分为两类。一类是《国策》、《国事》、《事语》,一类是《短长》、《长书》、《修书》。战国时游士的策谋言辞所涉,大都为列国的军、政大事,这些策言能唆使国家攻城略地,也可以使列国间化干戈为玉帛,极大地影响着当时列国的政治。这些游士的策谋言辞,惟其重要,或者说这些游士

^① 郑良树,1975,页141。齐思和也持这种观点:“《国事》、《国策》等本,盖以分国为篇者。”(见齐思和,1981,页229)

策言的编撰者为了夸大它的重要,所以把记载游士策言的这些书取名为《国策》,有关列国军政之策谋也;正因为这些策谋大都和列国军、政大事相关,所以叫做《国事》;这些军、政大事大都通过游士的策谋言辞表现出来,所以叫做《事语》。

在字面上,《短长》、《长书》、《修书》无疑有着最紧密的联系,对于这些名称的由来,王国维认为:“以其札一长一短,故谓之《短长》;比尺籍短书,其简独长,故谓之《长书》、《修书》。”^① 徐中舒亦认同这种看法:“《战国策》是先秦遗书,在汉代还保存了古代官府文书一长一短的形式,所以又称为《长短经》。”^② 在王国维之前的叶德辉也是这样解释:“刘向《战国策》叙录云:‘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余意当时以一国之事为一策,而其策有长有短,故又谓之《短长》。”^③ 以上持论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汉代人普遍都是把“短长”作为游士纵横术的代称。《史记·田儋列传》:“蒯通者,善为长短说”^④,《汉书·张汤传》:“边通学短长,刚暴人也,官至济南相。”颜师古[应劭]曰:“短长术兴于六国时,长短其语,隐谬用相激怒也。”张晏曰:“苏秦、张仪之谋,趣彼为短,归此为长,《战国策》名长短术也。”^⑤ 可见,司马迁、班固都是将“短长”理解为游士纵横术的。后来人的理解亦是如此。如《晋书·袁悦之传》:“悦之能长短说,甚有精理。”^⑥ 今人张心澂也认为:“谓之长短者,或誉其长而数人之短以媚之,或暴人之长而言其短以恐之,或言彼此之短

① 王国维《简牍检署考》。王国维,1996,第6册,页88—89。

② 徐中舒,1964,页134。

③ 叶德辉《书林清话》(观古堂原刊本)卷一,页10。

④ 《史记·田儋列传》。司马迁,1982,页2649。

⑤ 《汉书·张汤传》。班固,1962,页2645。

⑥ 《晋书》。房玄龄,1974,页1975。

长,以施离间,或事联络,要在随事而施之,皆游说士之术也。”^①又,《淮南子·要略》:“晚世之时,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②,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纵横修短生焉。”^③刘向《战国策书录》:“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纵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主父偃,齐国临淄人也。学长短从横术。”服虔注云:“苏秦法百家书说也。”^④以上“纵横修短”、“纵横短长”和“长短纵横”连言,更说明“短长”(或者是“修短”、“长短”)和“纵横”是同义词,用来指游士的策谋纵横之术,不但著书者这样用,而且早期的注家如服虔、张晏、颜师古也这样理解。“短长”、“长书”、“修书”之专称不见于先秦之书,可能是这些书在当时不被人重视并不广泛流传,但在战国中后期,实际上纵横术在当时举世侧目,是最快的拜相挂印的仕途之术,有大批的人在学习揣摩它,所以这种可能性极小;最大的可能只能是这样,这些书在当时并未成书,或者它们只是教授或学习揣摩纵横术的人随意编纂的一些本子,但当时并没有给它们取上一个书名,古书在其早期可以没有书名,这一点已成为古书的一个通例在今天为人们所承认,而且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有一种

① 张心澂《伪书通考》。此书初版于1939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后来作者曾加以修订,增补了一些考辨的书,也修订了一部分资料。本文使用的即其修订本,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1957年版。见张心澂,1954,页539。

② 王念孙云:“‘连与’二字连读,《汉书·武五子传》‘群臣连与成朋’是也。‘恃连与,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皆三字为句,则‘连与’下不当有‘国’字。盖涉注文而衍。”

③ 刘文典,1989,页711。

④ 《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班固,1962,页2798。

即是纵横术言辞的编纂本,正没有书名,而这已到了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了。不管怎么说,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短长》、《长书》、《修书》书名的确立,应该是在秦汉之时,那么距此并不远的《淮南子》、《史记》,似乎没有理由把这些名称理解错,倒是王国维他们错了。正因为纵横术又可叫长短术,记载游士纵横言论的这些书,于是就称为《短长》、《长书》、《修书》了。^①

所以,中书六号,名称虽异,但只是字面上的区别,实际上,它们的名称的来由都相同,即都是根据它们所记载的内容是游士纵横策谋之术而来,刘向之所以把《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这些不同名称的书集中在一起,也正是因为它们记载的内容相似,即记载游士纵横策谋之术。既然它们的名称都是根据它们所记载的内容而来,它们所记载的又都是策谋之术,所以中书六号,并非如郑良树所推论的那样在内容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今天,在已见不到这些不同名称的中书的本来面目的情况下,只根据这些书名在字面上的差异,就推论它们分别记载不同的内容,无疑是一种武断的作法。

所谓“国别者八篇”,又是什么?由刘向《战国策书录》,我们只能知道:①这八篇和其他的中书不一样,它们是按国别记载游士策谋的;②按国别编录的只有八篇,在数量上少不足,但似乎较有条理,并不像其他的中书那样“错乱相揉莠”,所以刘向重新编录时以它作为底本。③这“国别者八篇”没有书名。

然而,对此的理解仍然有歧异的意见。郑良树把“《国别》”作为书名,将其和《国策》、《国事》归为同一类书,并根据今本《战国

^① “长短”作为纵横之术,如张心激所言“誉其长而数人之短”或“言彼此之短长”,在今本《战国策》中,正有大量这样的例证:许多苏秦言“纵”和张仪言“横”的篇章总是成对地出现,面对同样的情况,苏秦言其长,则张仪必言其短,苏秦言其短,则张仪必言其长,纵横术又名“长短术”或即此而来。(又参下文所述)

策》每一国别里都有和《史记》相同的内容,便认为刘向见到的这部《国别》就是司马迁当初写《史记》时所凭借的材料,它是按以下八个单位:①东西周,②秦,③齐,④楚,⑤赵,⑥魏,⑦韩,⑧燕、宋、卫,⑨中山,分为八篇的。^① 齐思和也基本附和这种观点:“所谓《国别》者,盖每国一篇,共周、秦、齐、楚、赵、魏、韩、燕,故凡八篇。”^②

这种理解说服不了我们,因为他们都缺少坚强甚至说一般的论据和论证。如前所述,《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诸名称,均与所记之内容相关联,一般书名也是多少与其所记内容有关联,此处若此书仅仅因为分国别记事便取书名为《国别》,只与体例有关而与内容毫不相干,理由似乎并不充分;即使《国别》是书名,也不能证明《国别》一定就是按国别记事,刘向在整篇《战国策书录》中也并没有说《国别》就是按国别记事的。然而经刘向编录后的《战国策》却是按国别记事的,而刘向也说了,他编录的这部《战国策》主要就是“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而来的,所以刘向所说“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的“国别”,把它解释为体例而不是一个书名显然恰当得多;刘向《战国策书录》云:“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从文法上分析,若国别为一书名,则当云“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略以时次之”,否则就不文从字顺;刘向书录又云:“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刘向在这里把中书中有名号的全部都一一列举出来了,其中却并没有《国别》,若《国别》是一书名,刘向在此不会遗漏的,可见“国别”的确不是书名。

根据中书中的这两种书整理编录而成的这部书,刘向因为它

① 见郑良树,1975,页23。

② 齐思和,1981,页229。